

目 录

林树巍传略……………陈启著 罗康宁 (1)

陆幼刚传略……………陈启著 (6)

悼林元 怀逝者……………冯牧 (8)

√ 华侨领袖、马来西亚开国元勋——

敦李孝式爵士生平事迹简述……………罗琛原辑 (16)

罗汉烈士传略……………罗宏宇 杨常青 (32)

梁汉明的戎马生涯及其爱好……………梁伯彦 (36)

清湖、湘人称为林青天的林廷式……………陈坤中 (42)

林廷式在益阳二、三事……………盛星辉 (44)

清朝时期信宜两个女诗人——梁梅先 梁耀金……………

……………陈坤中 (45)

名中医梁明沧……………陈坤中 (48)

教师世家——访张翊民、张纲立教师之家……………

……………宁信绪 (51)

狮山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出贡献……………宁信绪 (53)

茶山人民在革命的挫折中前进 (革命回忆录) ……………

……………黄沛霖 (60)

抗日战争初期的信宜“妇运”……………梁巧云 (67)

我在信宜中区革命的回忆……………宁信绪 (71)

关于信宜瑶族史的若干问题……………罗 芥 (78)

信宜的移民概况.....	赖德荣 (87)
信宜玉雕工艺史略.....	梁光沛 (91)
征稿启事.....	(96)
更正.....	(97)

林树巍传略

陈启著 罗康宁

林树巍，字拯民，广东省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人。1889年11月出生。他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是辛亥革命的坚强战士，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参谋人员，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冒死护救孙中山脱险，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辛亥革命的坚强战士

林树巍青少年时喜欢学武术枪法，曾跟武术师傅“沙朗二”学习多年。清末考上广东虎门军校肄业，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朱执信领导的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回信宜与同盟会员陆匡文秘密设立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部，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入会者颇为踊跃。1911年3月29日，林树巍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没有动摇，又回信宜筹集枪枝弹药，力图再举。清朝粤督军张鸣岐鉴于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两次教训，害怕新军再次起义，又怕土匪参加革命队伍，乃调动新军远离省会进行剿匪，遣协办参谋黄士龙率二标新军到信宜进行清乡剿匪。这时，林树巍正准备再组织新军举行起义，因黄士龙到来而未能成功。于

是，用钱买通一个理发匠计划刺杀黄士龙，不料理发匠临场惊慌失常，致使计划未能实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0月10日，林树巍奉命赴高、雷领导起义，林树巍全力支持林云陔，他同信宜人、同盟会员甘熙初、陆耀文等，在信宜团防局挑选组织了一支选锋队（敢死队），率领他们首先发难，打响高、雷起义第一枪，由信宜出师向高州城挺进。在林树巍带头起义的影响下，高、雷部分新军和民军配合他所率领的选锋队，从四面八方包围高州城，使高、雷起义很快成功。

由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妄图称帝，辛亥革命遭受挫折。1913年之后，林树巍投入了讨袁（袁世凯）驱龙（龙济光）的斗争。当时朱执信负责广东军事领导工作，林树巍奉朱执信之命，由高、雷、两阳、四邑司令改任高、雷总司令，专事负责高、雷地区讨袁驱龙任务。正在军事行动紧急关头，高、雷道尹王典章突然从内部作乱，他秘密照会广州湾（今湛江）法国租界政府，借法国人之手把林树巍、林直勉、薛岳、梁卫平等八人逮捕起来，企图杀掉。后孙中山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致电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才把林树巍等人押解往越南河内囚禁，不久获释放。1916年春，高、雷讨袁北伐军基干队伍组成数千人，时林树巍改任北伐军经理局长，负责购运军械、粮饷的筹集调运工作。不久袁世凯突然病死，部队奉孙中山之命令，停止北伐，就地驻防训练。后林树巍改任总统府参军。

冒死护救孙中山脱险

正当孙中山挥师北伐的时候，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大本营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的陈炯明，暗地里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相勾结，并和湖南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处处给孙中山制肘。先则令所部粤军五十营从广西撤兵回粤；继则以辞去本兼各职为要挟，迫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叛逆之心，日益暴露。

孙中山于1922年6月1日毅然从北伐前线韶关回到广州，并以诚相见，教育陈炯明要以革命事业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陈炯明叛变之意已决。竟于6月13日密令叶举部占领广州东、西、北郊各战略要地，阴谋发动叛乱，妄图杀害孙中山。林树巍和林直勉、陆志云会集于广州东横街梁辛尝（信宜人，老同盟会员，原高州分府民政长）医馆，交换情报，研究局势，确悉军情十分紧急。是月十五夜，粤军陈德春部连长赖达（信宜人，老同盟会员）获悉陈炯明叛变之手令，秘密潜出营地，直接向林树巍和陆志云报告紧急军情。赖达说：“驻黄沙粤军已向北开动，陈德春命所部第一团守护沙面，第二团联络李云复部，向观音山攻击前进；驻高州会馆之熊略部则开往财厅前。”林树巍和林直勉、陆志云迅速奔总统府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正紧急调集部队，发动叛变的行动情况。孙中山听后说：“竞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说：“粤军（指陈炯明）素来

野蛮，不能不防备。”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但孙中山不肯离开。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只好退出。到了当晚深夜一时，事态越来越紧急，林树巍等三人又急速跑去见孙中山，再三力劝孙中山立即离开粤秀楼。在千钧一发之际，林树巍等即拿白夏布长衫给孙中山披上，用力挽着孙中山离开粤秀楼，步行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很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要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炯明叛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哨兵盘问：“往何处去？干什么的？”林指着孙中山对哨兵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我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若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孙中山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十足像个医生，就让孙中山等通过了。当林树巍护送孙中山到靖海路时，又遇到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及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态度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安然通过。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岸边，雇小艇渡江往海珠海军总司令部。海军哨兵喝问，林树巍说是有重要公文必须亲交温总司令（温树德），温树德出来，见是孙中山，便请同登楚豫舰。此时，炮声四起，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四千余人于16日凌晨三时左右，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但孙中山已安全脱险，转危为安。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自香港回广州，在广东省政府接见各界人士时，当面问邓泽如：“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等，现在何处？”并嘱邓泽如即电召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来见他。可见他念念不忘林树巍等三人护救之功。

出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之后

孙中山脱险之后，立即指挥部队讨伐陈炯明。1922年冬，林树巍出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从广州出发，驰赴高、雷，兴师讨贼。激战数月，把陈炯明余部胡汉卿所部数千匪兵打败，使高、雷地区恢复和平。接着于1923年2月他兼任高、雷绥靖处处长。是年冬12月，桂系军阀陆荣廷部属申保藩侵犯化州、廉江，林树巍率师征剿，申敌败退钦州。

1924年春，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吕春荣等联合以万余之众，竭尽全力进犯高、雷。林树巍在内无储粮，外无接济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抵抗，死守弥月，终因饷绝弹缺，战事失利。他的部队改编为西路讨贼军第五师，他任师长，继续于高、雷、两阳、四邑坚持讨贼作战。1924年10月22日，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于大本营效力。翌年，孙中山逝世后，林树巍辞去所任职务，到香港居住。

1931年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林树巍从香港回中山县任公安局长。不久又到香港。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于1938年由香港回故乡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定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林树巍任信宜县参议会议长。1949年11月29日病逝于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终年六十岁。

陆幼刚传略

陈 启 著

陆幼刚（1892—1983），号厉庵，广东省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广州市参议会议长等职。

陆幼刚出生於一八九二年。少年丧父。稍长，到广州读书，加入同盟会，与林云陔一起，秘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他与兄陆匡文随林云陔到香港提取武器，分别取道江口返高州，共同研究武装起义事项，在林云陔的组织指挥下，高、雷起义成功。民国建立后，进北京大学深造。毕业后回广州，值袁世凯窃国，陆幼刚联电声讨。后赴日本，与孙中山相会，並服务於孙中山左右。不久即随孙中山归国，参加讨袁。一九二一年冬，孙中山率师北伐，陆幼刚任大元帅府度支处出纳主任。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陆幼刚协助总统府秘书林直勉、总统府参军林树巍掌握陈炯明军事行动情报，商议决定由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直达总统府向孙中山报告，使孙中山能及时离开粤秀楼。与此同时，陆幼刚为解决军饷，亲自找到广东省银行行长黄隆生，设法提取到部分款项，以利讨伐陈炯明。讨平陈炯明之后，陆幼刚任大元帅府秘书、法制委员会委员。孙中山逝世后，陆幼刚先后任鹤山县长、江门市长、广州市政府秘书长，以及广州市土地局、财政局、教育局局

长职务。一九三一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曾二度代理省主席职务。同时他还兼任广东师范学院、广东法商学院、广东省文理学院讲师、教授。在这个期间，主编《广东文教》杂志、《广州文教》杂志，创办《广州市民报》、《广州日报》等报刊。他著有《国父史略》、《中国大学制度考》、《小学制度改革刍议》、《广州革命史迹》、《广州文教史》等书出版发行。

一九三六年，陆幼刚任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委，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开展之后，任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中将专员，巡视战区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广州市参议会议长，一九四七年任民国国大代表。

一九四九年，陆幼刚迁居香港。在香港期间，创办培之中学，並任董事长。后应邀赴美国在南加州讲学，一度任罗省中华学校校长，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为培养海外华侨人才作出贡献。以后因年事已高，才辞去所担任校长职务。

陆幼刚从政公余之暇，还司诗、书、画，且有成就。他的“桂林寻梅诗”反映较好。这首诗是：“一枝疏影覆云根，西子桥霜印屐痕，待鹤归来人万里，江南重忆最销魂。”他的隶书比较有名气，被誉为“雄浑遒劲，自成馨逸。”他的画更有影响，《木棉图》是他的代表作。中山郑春鑫所著《岭南画人传》中对陆幼刚的传述说：“工诗、才气纵横，风味纯厚，性好游，暇辄啸傲溪山，搜奇摘异，见闻既广，阅历自深，画笔日益奇肆，盖山川文物，每每相因而成”。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梅园诗稿》、《幼刚书画集》，於一九四九年前曾刊印发行。

一九八三年，陆幼刚病逝於美国，终年九十一岁。

悼林元 怀逝者

冯 牧



这是林元同志1949年
解放出狱后摄影



这是林元同志八十年代
参观西安文化古迹时摄影

（编者按：林元同志是我县镇隆镇西岸村人，我国著名编辑家、作家。不幸于1988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去年本刊第五辑曾转载北京《文艺研究社》为悼念他而撰写的传略一《林元同志生平》，现再转载冯牧同志在《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的这篇文章，使大家对林元同志有更全面的了解。）

清明前夕，突然传来了林元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一种深切的痛惜之情使我的心中好象遭受了沉重的一击。我和林元同志的友谊交往算来已有三十一年的时间；那是从一九五七年底，我奉命去接办刚刚受到了近于摧残性打击的《新观察》时开始的。在被改组的《新观察》编辑部留任下来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当中，林元同志是从一见面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在我在《新观察》工作的短短一年来时间中，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那时，还不具备如象现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但我不论从林元身上或从另外一些同志身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共有的真诚的愿望和感情，这就是：尽管我们谁都不可能抗拒或抵御当时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极左思潮，但是，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刊物办得尽可能为广大的读者所喜爱或所乐于接受。我真切地感觉到，在包括林元在内的几位当时的刊物骨干力量的心中，都具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心情。

在这期间，我发现了林元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极为可贵的品质。我发现，这个当时还没有入党的老编辑，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炽烈的劳动热情、忘我的工作积极性以及接近于足智多谋的编辑工作才能，使我们当时濒于瘫痪的刊物，很快地便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运转。我应当坦率地说，在我刚刚被调到《新观察》来取代那位我所尊敬的、当时被不公正地戴上“右派”帽子的戈扬大姐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不安的，也是毫无言心的；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在我身边，有许多双友善的手在扶持我，帮助我，（而不是在排斥我）。而其中，林元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我时时为林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无私、殚思竭虑的事业

精神和工作热情所激励。也就是在这时，在讨论他要求入党的支部会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历史和生活道路，了解到他并不是一个以普通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是一个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人民解放事业的爱国者，一个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学运动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有理想、有信念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经在当时风靡全国、对蒋管区的民主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观察》杂志工作过很长时间，作为储安平助手，经过他的手发表过不少进步的革命的乃至是出于地下党员手笔的文章。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为此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一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战士打开了当时关押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政治犯监狱，他才获得了自由，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当时，作为党外进步人士的林元，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如同一名革命战士一样地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这一切，我都是在五九年讨论林元入党的支部会上才了解到的。而这些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都是经过了反复的严格调查之后才得出的结论。他正是因此而理所当然地被接纳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由此才使我对于林元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我才开始懂得为什么一个被人们视为“党外人士”的编辑会具有如此自觉的责任心和似乎是永不会枯竭的工作精力。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出版的每一期《新观察》当中都包含着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心血和劳动成果。他是一个提选题、出主意、结交作者和组织稿件的能手。他自己也能写很漂亮的散文和很有见解的评论，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编辑工作上，正如他自

己所常对我说的，“我一辈子都是为别人作嫁衣裳的，我对于当好一个刊物的编辑，是乐此不疲的”。林元的一生，确实是一直在这样身体力行的。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编辑出版过在当时颇具影响的进步文艺刊物如象《文聚》等，在那上面发表过许多激扬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许多作家（如象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都曾经给过他以支持和帮助。从此，他就以编辑工作作为向自己的神圣目标奋力前进的工作岗位，而且做出了认认真真和切切实实的工作业绩，一直到他年过古稀，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才不得不心怀栈恋地离开了他在《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办公室。

因此，在我的思想里，林元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位极其难能可贵的，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文艺编辑工作而且做出了显著成绩的好同志、好编辑。尽管他在有一段期间调到了文化外事部门，而暂时离开了编辑工作，但我们相信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我永远把他看作是一个在文学队伍中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和好编辑，一个值得尊重和钦敬的毕生“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任劳任怨和甘之若饴的人。

象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实在是太少了。

我和林元在《新观察》工作期间结下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我们后来分处在不同的工作部门而中断。在十年浩劫时期，我们曾经一起被关在一间地下室中，并且一起在湖北干校劳动过，在这段期间，我们得以互相倾诉过自己的心境和经历。他时时自然流露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信赖。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显著地消瘦了，银白色

的头发也变得更加稀疏零乱；从他艰难迟缓的动作中我感到他正在竭力克制着自己的病痛。他告诉我，他得了糖尿病，这种病，在干校的条件下是一种灾难性的疾病。但他同时又说，他虽然时时感到痛苦，但他还是乐观的，他相信我们都能够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能够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一天的到来。我相信他的说法，而且为他身上经常自然散发出来的乐观主义情绪所感染。至今，在我头脑中仍然不时闪现出他在干校参加劳动时的步履蹒跚的身影和他的虽然日见憔悴却永远坦诚而乐观的面容。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终于又获得了和林元在一道工作的机会。那时，我在文化部负责艺术研究院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三中全会后，文化部决定筹备出版一个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的理论刊物，这就是创刊于一九七九年五月的《文艺研究》。我建议调林元来参与筹办这个刊物，我始终认为，在当时可供抉择的对象当中，林元是一个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后，他就把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个刊物，简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开始的两三年中，林元还都不是这个刊物的正式主编，但我现在应当公正地说，从一开始，林元就是《文艺研究》这个后来声誉日隆的刊物的实际上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曾列名为刊物的主编，林元是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但是，如果说这个刊物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方针，如果说这个刊物在八九年的时日里曾经克服了众多的难以设想的困难，在这漫长的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方针和目标，而没有随风摇曳和动荡不定的话，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林元同志在其

中是起到了值得表彰和赞扬的重要促进作用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情投意合的积极精神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活力，为这个刊物的从诞生、发展、坚持、巩固到稳步发展而付出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年人所可能投入的最大的精力和干劲。他曾在重新工作前一次因公出差中跌断了腿，但他却泰然处之，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需要，他就如打仗一样，不失战机，立即拄着手杖为了办好刊物和组织高质量、多品种的稿件而到处辛勤奔走。因此，我虽然在刊物创办之始曾经忝列主编职务并且参与过一些工作，为刊物的方针和指导思想的确定提出过一些建议并且和林元同志以及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顺利地取得了共同的想法；但是，刊物的实际的主持人是林元而不是我。我时常怀着一种欣慰乃至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我和林元之间关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又要使刊物具有自己的鲜明主张和性格的多次讨论；我高兴地看到，林元在主持刊物编辑工作几年间，对于我们所共同确立的方针和编辑思想，一直是信守不渝的。后来，他在别的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使《文艺研究》不仅在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而且在广开文路而又有所倡导方面，也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一点，应当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

林元同志在一九八七年终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这是早在我预料之中的事；因为我看到近年来他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外貌和举止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衰老得多；但是他的那种心无旁务，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扑在编辑工作上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和毅力却使我为之深深感动。

我预感到他的来日无多了，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他会那样早地便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战友，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革命事业。他一生自奉甚俭，自律甚严。他去世以后，我和一些老战友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的夫人钱云同志和他的子女。走进他的俭朴的居处，使我有一种四壁萧然的感觉。当他的女儿林平把他去世前不久用断续无力的声音口授的遗嘱拿给我看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发出的，是使一切正直的革命者都会感到悲痛和震动的声音。他在遗嘱中说：

一、遗体献给国家医学科研事业，不留骨灰；

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会，以免劳民伤财；

三、我一生喜爱并收藏齐白石老人四幅画。白石老人的画是国宝，国宝应归国藏、国有。

四、我一生为他人做嫁衣裳五十年，剩下一点“碎布”，约三四十万字，请王致远同志编成《碎布集》，并作长篇编后记，请冯牧同志作序；

五、《碎布集》出版后所得稿费留给钱云晚年生活。

回顾一生，所作坦然。妻子儿女待我之好无以复加。希望林平多关心妈妈，听妈妈话。妈妈也要多关心林平。我飘然而去，云游四海而无所挂念。

又及：关于《文艺研究》，希望王波云同志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抓好工作，继续前进。《文艺研究》十年来的办刊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不断解放思想，贯彻百家争鸣，搞五湖四海。这已得到王蒙、李希凡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对此非常感谢。

林元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

我捧着这份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的遗嘱，沉默良久，我的心在颤抖。这是一个一生为祖国文艺事业、也为他人的茁壮成长而劳顿奔忙的普通编辑工作者在临终时发自肺腑的声音。这张纸很轻，但在我手上却有千钧的份量。林元已经永远地去了，但在我眼前，却仿佛长久地屹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他身上，一颗忠诚、炽热、纯朴、热血沸腾的心，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逝者长已矣，但有些事情对于如象我这样的幸存者，心情却不能平静。林元是一位为我国的新文艺事业奋斗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文艺战士。他为此曾经在敌人的监狱中进行过勇敢的斗争。然而，我听说，他在全中国解放前所进行的战斗和所做出的贡献，至今并没有被得到认可，因而，他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所得到的待遇只能是“退休”，而不是“离休”，我作为林元的一个战友和故人，不能不为此而长久地悒悒于心。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急就

（编者注）：据林元同志的遗孀钱云同志提供资料说：林元起初被误诊为糖尿病，直至逝世前一个月发现黑色大便，才疑为肿瘤，但已来不及挽救了。逝世后作病理解剖，确诊是胃癌，已扩散至大肠网膜、肝、胸椎、咽喉各部位。